

蘇俄對西方評論其經濟改革的反擊

呂律

壹 前言

在柯錫金對俄共中央九月（一九六五年）全會報告經濟改革案時，曾在最後一部份說過，預料在這個案子通過以後，國際間一定要有一個巨大的反應。

柯魔這個預料並沒有錯：自哈爾科夫大學李柏曼教授提出有名的「計劃、利潤、獎金」的論文以後，西方就不斷加以注視和評論，不過，在俄共發表它業已通過的經濟改革案以後，西方的評論雖然仍舊多不勝數，但比較起來，已感若干失望。

西方對於蘇俄經濟改革的評論，大致集中在下面四個主要問題上，即：

- 一、蘇俄開展經濟改革論戰和決心從事經濟改革的背景和原因；
- 二、蘇俄一貫奉行的來自中央的計劃制度；
- 三、擴大各企業經營自主性；
- 四、社會主義中的商品—貨幣關係，特別注意的是商品貨幣關係中的市場與利潤問題。

蘇俄對西方有關上述四大問題的評論，都分別有其自以為是的反擊，而我們在它們彼此之間的評論與反擊中，很可能對蘇俄的經濟改革獲致一些新的認識。

貳 蘇俄開展經濟改革論戰和決心

實行經濟改革的背景和原因

西方一些蘇俄問題專家認為，蘇俄發生經濟改革論戰和決心實行此項改革，是因為蘇俄的經濟「一塌糊塗」和「雜亂無章」，說「蘇俄的工業已呈蕭條的景象」等等。他們確信，所有這些情形，就迫使蘇俄要改革其經濟領導的方法，因為過去的領導方法已遭遇失敗。譬如，美國「時代」雜誌（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直截了當的說：假如現時已經顯示出來，蘇俄經濟繼續不斷下降的發展速度並無「黑暗的遠景」的話，蘇俄的經濟領導人們又何必展開一場論戰呢？

蘇俄不承認它所展開的經濟改革論戰和採取的措施是因為經濟發展速度降低之故，它提出許多理由加以辯證，譬如，它說：

一、西方經濟學人藉口於一項事實，即一九六三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八·五%，而一九六四年祇增長了七·一%，這是最近三十年來最低的一個發展速度，是不錯的，不過，西方經濟學人們確信，蘇俄發生經濟發展速度降低的情況是規律性的，而且今後仍將繼續下去，關於這一點，蘇俄不能同意。

二、當前蘇俄經濟加速發展的潛在可能性，不僅是與生產增高的水準相結合，也同蘇俄經濟方面客觀上新的質變相結合。這些變化的實質，在於蘇俄五十年代的經濟，就其發展水準和結構來說，已經形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它的各方面都已現出更能平衡發展的可能性，建立起實行社會主義法則經濟制度的新條件，並且已有必要在經濟領導方面加入一些相當的修正。

三、以前，在工業化的年代，在戰爭和戰後的恢復年代，為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市場有許多供不應求的情況，那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在於多多生產，保證高速度發展的經濟，並抵銷居民全部支付能力需求的數額；

現時，蘇俄生產資料和非食品的消费品市場，具有一切都已充實起來的特徵，各企業和居民對於大部份此類商品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滿足（當然，社會主義市場上的充實并不就減低生產更多產品的任務，此項任務依然如故，因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儘可能更充分和全面發展和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目前市場上的情況將稍許按新式提出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關係。與生產和消費發展的同時，它們的結構狀態問題就具有非常迫切的性質，現在的企業要無與倫比的較諸以往對消費者需求自己產品的情況有更多的關懷，機動的改變態度。

四、管理企業的形式和方法，已不能在新條件下再保持以前那樣經營條件的狀態，它們應當加以改變，必須找出完全符合國民經濟當前情況的經濟領導形式和方法，有助於實現加速經濟發展的新可能性。

叁 關於蘇俄來自中央的計劃制度

西方的專家們討論蘇俄經濟方面最熱烈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關於蘇俄一貫實行的中央計劃制度。這個制度在西方人看來，是它的經濟陷於混亂日趨衰敗之源，也是百弊叢生之藪。譬如：

美國「商業週刊」相信，蘇俄的學者們在經濟論戰中說不定會提出一項主張，在這一項主張實行以後，將使來自中央的計劃制度壽終正寢，用市場經濟取而代之。

西方聞名一時的經濟學人，如A·貝爾格遜、M·郭爾德曼、A·諾伍夫及其他一些聞名的經濟學人，一向不把中央的計劃制度視為一個經濟範疇，他們說這是「國家的強迫」，「官僚主義作風」，「是在行政命令協助下的管理」，是「純粹用行政命令分配資源」，是「任性」等等。

英國的「每日電訊報」(一九六五年九月廿九日)說：「蘇俄的計劃機構，應當大大加以破壞，並且以市場經濟取而代之」。

一位法國經濟學人鄂伊涅寫道：「共產主義計劃的困難，大多數是因為共產黨人不能找到像競爭那樣有效的方法來保證經濟正常的職能。」

西方的蘇俄問題專家與知名的經濟學人對於來自中央的計劃制度的痛詆，蘇俄表示不能接受，它的理由是：

一、西方的經濟學人把中央計劃制度解為純粹的命令主義，是武斷了這

個形式，完全忽略了它的內容，而它的內容是說，社會主義經濟來自中央的計劃，是一種客觀經濟規律，是以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經濟聯繫的基本方法之一。

二、俄共中央九月全會的決定，顯然使西方的經濟學人大為沮喪，在此項決議中指出：「工業領導方面的嚴重缺點，是有害於經濟方面的行政方法佔了優勢」。全會並且指示消滅此項缺點的途徑是：在中央計劃工作方面提高科學的水準；嚴格考慮社會主義經濟的法則；達到經濟發展的比例和效率；在保證各企業工作有更好的條件方面，加強經濟核算，擴大各企業的自主性。

三、蘇俄的經濟發展令人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央計劃制度是優越的，它猶如在資本主義競爭之前的一個主要的生產調節器。俄共中央九月全會曾經強調指出，脫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計劃領導方面的中央計劃原則，必不可免的要在資本主義經濟之前為它的優越性帶來損害。

四、除了來自中央的計劃是直接調節各企業及整個國民經濟工作的方法外，在社會主義之下還有一些間接的方法——在經濟核算的基礎上為各企業建立有助於它們組織工作相同的經營條件，不利用商品—貨幣經濟關係是不行的，這其中也包括有社會主義內容的市場關係。

五、中央化的計劃制度同資本主義的市場是合不攏來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確實沒有那一種市場，但是却不能說蘇俄根本沒有市場。

肆 擴大企業經理經營自主性問題

最近幾年，西方的蘇俄問題專家對於蘇俄經濟改革中的「擴大企業自主性」問題，一直非常注意，他們認為這是蘇俄要放棄中央化計劃制度的試步，也祇有企業的自主性擴大起來，才能結束來自中央的計劃的桎梏。西方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直至俄共中央九月全會通過經濟改革案以後，仍未稍衰，各報刊仍在熱烈加以評論。譬如：

法國「世界報」(一九六五年九月廿八日)在社論說：在我們的想像中，蘇俄在實行經濟改革以後，國家與各企業之間的關係，將依照大家所知道的，類似C·威爾遜的名言那樣的原則來建立，即：「對於馬達工人是好的，

也就對於聯邦是好了。」

某一些西方作家，如英國的經濟學家D·西蓋爾在一篇題為「蘇俄的經理獲致重大的比重」的文章中，希望蘇俄實行這樣一種改變：「將蘇俄各企業經理的權力和威望予以提高，並且在將來實行……混合的經濟，在許多方面同我們相似。」

某一些西方經濟學人，在實現「擴大企業自主性」方面，對蘇俄持懷疑態度。如英國A·諾伍夫教授寫道：「保存中央化計劃制度加上物資高度增長和充分利用，也許都是同企業以利潤為動機的活動勢不兩立，不論當局在擬定獎勵基金的章則、規定價格表現出多麼大的彈性，都是一樣。」

法國「觀察雜誌」關於蘇俄擴大企業自主性，也抱懷疑態度。這個雜誌寫道：「這種企業，當然說不上是自由企業，而祇是在規定範圍內有其主動性的自由而已。」

蘇俄關於這一方面的反擊很多，我們為明瞭它對於這一方面的看法和作法起見，姑且選擇七點如下：

一、俄共中央九月全會的決議中說過：「在生產計劃和管理方面要求有巨大的彈性和實際性，懂得及時考慮在改革中的經濟情況、調度物資、結合生產與不斷增長的居民的需要和 demand、加強經濟核算、迅速採用科學技術成就，在企業的具體條件中找出更好的解決經濟任務的方法。」為了解決此項問題，全會規定許多具體措施的方法：取消對企業活動方面多餘的規定；減少中央化計劃的指標項目，並且將其中某些指標換為更有效的；分配企業發展和完善生產必需的資金；加強經濟刺激。此外，在全會的資料中還談到將來可能實行預定的一些改革措施，譬如，將工資基金從上級為企業決定的指標數目中取消。為了實行這一點的遠景條件，是人民消費品生產和服務行業的工作已經大為擴充的時候。

二、蘇俄擴大企業自主性、加強和發展經濟核算的步驟，絕不是要使個別企業的工作同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受到破壞。

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所有制，是以企業管理的型式完全不同為條件。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建築在民主集中制的上面，在企業管理方面，是勞動者和他們的社會組織扮演重要的角色。經濟改革把企業自主性擴大，正為羣眾廣泛參加生產管理而創造前提。

蘇俄對西方評論其經濟改革的反擊

四、A·諾伍夫教授不了解發生在國家與各企業之間的變化的實質，中央化的計劃是集中在一些有關鍵性、有決定性的項目上，而為企業規定的指標，其範圍祇限於那些完全為結合企業工作與全部國民經濟所必需的和不可少的方面，但是在各式各樣具體的歷史條件上，這個範圍可以廣一些，也可以狹一些。蘇俄的一些經濟學人和經濟工作者以為，將來要造成一些可能性，不由中央為企業規定工資基金、縮小由上面規定產品的品類，而以後也許完全放棄來自中央的計劃。

五、整個的問題是這樣的，對於國家來說，重要的是企業在它的工作結果方面保證由上面規定的一些指標，至於其他的指標形成一個什麼樣子，這已經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了。

六、A·諾伍夫教授的執心是徒然的，因為問題在於他在什麼上面去看。最重要的，是正確決定和及時改變中央為企業規定的指標範圍，不可以還沒有造成足夠的客觀條件之前，超現實的減少上面為企業規定的指標。但是，假如說某一種指標已不再由上面規定了，這是表示有關計劃這一指標的一切問題，已經都是企業的職權了。

七、改革的核心就在擴大企業在中央化計劃方面的主動性，並且使企業不因此而成為資本主義式的企業。這是正確的。至於「自由」，這一點，蘇俄同「觀察雜誌」的觀點有原則上的差異，蘇俄相信，企業工作方面的社會主義原則，有可能達到真正的自由，自由是同認識和在實際上顧到客觀規律分不開的。

伍 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問題

西方的學人，除了對蘇俄經濟改革中的中央化計劃、擴大企業自主性的一些重大問題，熱烈加以討論外，他們更注意蘇俄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貨幣關係，特別是關於利用利潤、盈利率、利息、信貸等等形式的問題。譬如：

一位聞名的西方蘇俄問題專家G·葛羅斯曼寫道：「就傳統來說，社會主義者是否定利息的，他們把利息視為最令人不快的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一。」

英國有一個刊物也發揮此項議論，它說：「依照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觀點，利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並且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理由。」

美國「時代」雜誌論「共產主義基本信條的大失敗」一文說：「共產主義指利潤刺激是一種邪惡的東西，它對於社會主義的作用是不需要的，馬克思主義者確信，可以迫使人民像士兵像聖徒那樣為國家的福祉而工作。」

蘇俄在這一方面對西方所作的反擊，也是多不勝舉的，其中最具參考價值的如下：

一、蘇俄的「經濟問題」月刊在一篇文章中說，不錯，過去蘇俄的經濟學人曾經一般的排斥過在社會主義之下有商品生產的存在，甚至於在比較不怎麼久遠的過去還有一些個別作家會根據這一觀點寫過一些書。不能不承認的是，這種觀點對於深一層去研究價格、盈利率、利息、利潤等等經濟核算方面的作用，是沒有幫助的。在社會主義之下承認和根據商品生產的原因、內容、職能和它的類別，是蘇俄經濟中佔優勢的一種趨勢。

二、要是說蘇俄的經濟理論是排斥物質刺激的，並且在社會主義再生產的過程中駁斥商品貨幣形式消極的作用，這都是不正確的。以俄共的黨綱為例，它說：「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針對着在社會主義時期業已成熟了的新內容充分利用商品貨幣的關係，在這一方面採用那些發展經濟的工具，如像經濟核算、貨幣、價格、成本、利潤、貿易、貸款、財政，則具有重大意義。」

三、關於物質刺激，在黨綱上清清楚楚的指出：「……共產主義的建設要依靠物質刺激的原則」，而且，早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列寧曾經寫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應當直接建築在熱情上，而應當建築在偉大的革命熱情協助下的個人利益、個人福利、經濟核算之上。」

四、蘇俄目前具有許許多多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與貨幣、信貸、財政、經濟核算、價格構成、經濟職能有關的科學著作，而且非常豐富。

陸 市場與利潤問題

在前面，我們會說過，西方學人特別注意現階段蘇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市場和利潤問題。在西方學人看來，凡是市場都是資本主義的，蘇俄談不到

有市場。譬如法國一些蘇俄問題專家，如R·莫塞和鄂伊涅等人，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之下根本不能說有市場，他們認為「蘇俄完全沒有買賣之間的任何關係」，「蘇俄沒有……需求和供給的法則，同時完全是市場機械主義」，他們斷定，集中規劃是不要市場的，商品的交換和貨幣的流通，在社會主義之下都富於羣衆性。

自從蘇俄經濟改革大論戰強調市場的重要性以後，西方經濟學人一致認為蘇俄是在借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了，要把某些用時間創造出來的自由企業經營的方法注射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中，尤其在俄共中央九月全會以後，更加强調這一點。譬如：

「法國晚報」(一九六五年九月廿九日)說：「蘇俄所獲得的新改革經驗，是來自資本主義制度的經驗，在傾向西方企業經營的方法和成就。」

法國「民族報」(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也響應此種說法，它寫道：「蘇俄從此要向他仇視的、為資本主義所固有的方法過渡了。」

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一九六五年九月廿九日)評論蘇俄此項經濟改革，是對資本主義市場方法的一項「重要的讓步。」

美國經濟教育基金會總裁L·黎德發表一篇文章，旨在證明經濟方面的秩序，祇有在「自由市場」，也就是祇有在資本主義之下，才能得到保證。他相信，競爭也像生存鬥爭一樣，是自然而然的，是適合人類的天性的，不是由彼此作主的經濟決定為依據的自由市場，不可能同自由行動的個人諧調相處。

蘇俄對於以上的評論，所作的答復和反攻，自史達林有生之日所說的以至於現在，完全沒有什麼不同，譬如：

一、中央化的計劃制度同商品—貨幣關係，並不是完全彼此排斥的兩種現象，但是中央化計劃制度同資本主義的市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沒有那一種市場，然而却不能說蘇俄完全沒有市場。

二、商品生產及其他一切要素(包括市場)的必要性，在社會主義之下是以勞動的性質為條件的。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不同於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之處，是它還不可能把社會生產的全部環節都用生產和有效的技術裝備得一模一樣，還不能在各不同的工段上將工作組織得一模一樣，還不能保證在具體生產的職能方面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比一模一樣，同時

勞動生產率還不能高到可以建立起豐足的消費福利。所有這一切，迫使嚴格的把各種工作人員和各種集體對社會生產所作的貢獻加以比較，以便保證在分配方面的平等和交換方面的合理。

三、商品—貨幣關係，在社會主義之下，是經濟聯繫上的一種形式，它將各種費用依照唯一的社會尺度加以比較，並且實行生產結果的合理交換。

四、蘇俄的經濟改革，是更廣泛的在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的可能性，而絕非利用資本主義的，這兩種市場彼此有其原則上的不同。

五、社會主義市場的新內容，是它所固有的，它以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在社會所有制之上為其先決條件，因此它是有計劃的在發展。蘇俄全部社會生產的計劃性所以能得到保障，是因為經濟一切方面的主要調節器不是市場，而是中央化的計劃。

六、社會主義國家重要經濟生活範圍內，如像再生產主要部門和主要區域比例的決定，國民收入中生產與積累的對比關係，勞動力的分配，個人消費基金的分配等等，並不是在市場的基礎上調節。

七、在社會主義之下，市場的作用是為達到生產來自中央的計劃的參數而服務，不利用社會主義市場這個機構和它的一些門類，如像行情、價格、需要、供給，就不可能保證各企業在澈底經濟核算上工作。

至於利潤，在西方學人看來，原則上是與資本主義分不開的，所以，在此次經濟改革強調利潤的動機時，美國的B·赫伍茲黎茨教授和N·史密斯教授及英國的A·諾伍夫教授，他們都確信祇有用價值法則自發的活動，才能保證最高的經濟效果，社會愈發達，愈是需要自發的調節生產的資本主義的方法，因此，蘇俄更廣泛的利用利潤作為社會主義企業工作有效的標準，在西方學者的文章中，有解釋為這是在走資本主義的路子。

蘇俄反對西方的看法，它不承認利潤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專利品，一旦被社會主義國家採用，就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嫌疑和可能性，它所持的理由是：

一、利潤在社會主義之下，祇可以作為評價個別企業工作的標準，而不是作為評價整個社會生產的標準。

二、在社會主義之下，利潤既是屬於由勞動人民及其家庭成員而組成的

社會，它既然為發展社會生產和增進消費品而服務，所以它當然也有表達整個社會生產的效能。

三、但是利潤不能提供充分的評價，社會主義的生產愈高，則滿足社會需要的水準和程度亦愈高，而所費的勞動、物資和財政資源就愈少，因此，顯而易見盈利率這個指標祇有助於說明社會生產效果的某些方面，但不能包括它所有的極為重要的方面，不能作為它的主要標準。

總之，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貨幣關係（包括市場和利潤問題在內），蘇俄對西方學者的看法和批評，一向堅持以下的傳統理由：

一、並不是資本主義所採用的形式和方法，社會主義即絕對不可採用，一採用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退却。事實上，社會主義採用資本主義的形式和方法，是繼承，而且問題在如何繼承和繼承些什麼。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這句話應當作這樣的了解，即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它是前一個階段——資本主義——所培養出來的。當然，這并不意味着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開始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形成，馬克思根據科學的分析否定這個觀點。「社會主義係由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這句話，是另一種意義：資本主義在使社會再生產複雜起來的時候，用它活動發展方面整套的具體形式的經濟交換制度、整套合理的經濟聯繫制度，來調節經濟發展的經濟機構。社會主義否定資本主義的是取消私有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所保存的是一切為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良好而珍貴的成份。資本主義所建立起來的許多調節生產的具體經濟形式，正好是社會主義革命不要拋棄的，而要從資本主義方面繼承下來的。

二、當然，社會主義並不機械主義式的去模仿資本主義這些調節經濟的形式，實質上社會主義要將它們加以改造，首先社會主義要將它們放進一個完全是新的、在本質上是一個更高度的社會生產組織的制度中，這個制度有兩大特點：中央化的計劃和利用羣勞動積極性與經濟主動性的廣泛民主。放到這個制度之中的，還有那些由資本主義繼承下來的，如像一個企業範圍內的規劃、市場、利息、利潤、價格、盈利率及其他調節生產與交換的經濟形式。所有這些工具，在社會主義之下都將失掉它們以前的剝削性質，並且要具有新的內容，因為它們所服務的完全是新的經濟關係。從表面上看來，它們的外形很像從前那樣，可是它們的實質和職能業已大為改觀。

柒 結 論

西方學人（包括日本在內）對於蘇俄經濟改革的看法，總括起來，大致有下列幾種不同的見解：

日本「讀實新聞」（一九六五年九月廿九日）的評論，說蘇俄的經濟改革，是「回到資本主義」。

法國「世界日報」（一九六五年九月廿八日）在批評那些對蘇俄經濟改革含有敵意的責難者時，問道：「可否說，它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呢？」

英國的「經濟學人」肯定的說：「歐洲的共產主義……正在進行實驗，它的目的是要看看可否稍微資本主義一點。剩下來的問題是，要看看採用『市場原則』還有多麼遠，並且在這種原則之下不使任何一個共產黨員同私有制調和起來。」

美國的「華爾街日報」（一九六五年八月卅日）寫道，蘇俄「正面臨非常重要的經濟改革。此項改革的結果將多多少少接近於資本主義制度。」

一些西方的經濟學人持一種比較新的折中的看法，認為社會主義將逐漸接近資本主義，反過來資本主義亦逐漸接近社會主義。譬如，U·藍比爾奧特，他承認資產階級的思想同馬克思的思想為南轅北轍的同時，並且認為，或許「蘇俄和西方工業發展在第三個世界之前具有某種共同性。」依照他的意思，如果說兩個制度「一貫都是對抗的」，那是不正確的。他這種理論的根據，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業已重視市場、利潤、利息等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一些概念。

國際間反共開人G·席華爾茲比較冷靜，他認為應當把這個問題對自己的同行解釋一下：「某些人確認蘇俄逐漸成爲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是不正確的……它絲毫未表現出有結束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換爲私有制的傾向，資本主義的本質當然是表現在資本私有的上面。」

西德的「德意志新聞」（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對於蘇俄的經濟改革也有其不同尋常的看法，它說：「凡是以爲共產主義已至窮途末路，並且認爲共產主義的領導轉向資本主義之途，已指日可待，這種評論未免離題太遠

……。

總之，不論上面任何一種觀察和判斷，說蘇俄的經濟改革「回到資本主義」，還是說「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或者「稍微資本主義一點」和「多多少少接近資本主義」……都是不可能的。這些議論都忽略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對立性，及俄共政權是以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爲基礎的事實，假如說事實確如西方學人所說的在走向資本主義，則必須廢除社會所有制而恢復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如此，無異自掘坟墓，決非俄共改革其經濟的目的。更嚴重的是，大都忘記蘇俄經濟改革的目的，是要在兩個不同社會制度體系的經濟競賽中取勝。所以，西方要想達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在一個經濟範圍內共存，祇有一種情況是可能的，即資本主義自動的承認失敗，向社會主義過渡，否則，要想社會主義再回到資本主義，祇有將它澈底擊敗。

蘇俄已一再表示，它在三十多年以前就解決了「誰勝過誰」的問題，因此沒有絲毫理由可以認爲它會心甘情願的再回到資本主義。但蘇俄所實行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事實證明其無法成功，因而不得不採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若干重要措施以濟其窮，不過蘇俄不肯承認此種事實而已。

俄羅斯史

呂律譯

俄羅斯史爲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樸希加廖夫根據俄國古代編年史及其他許多寶貴歷史文獻編著而成，由我國俄國問題專家呂律先生逐譯，不但內容豐富，譯筆流暢，實爲我們出版界不可多得之俄國信史，全書三十萬言。

平裝定價新台幣五十元，精裝六十元。均特價七折。在學學生及軍人按定價五折優待。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